

中国家庭德育发展的进路探赜

欧阳鹏¹, 胡洁²

(1.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2.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8)

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更是人安身之所;家庭道德是社会风尚的基因,更是人立命之元基。中国传统家庭德育积厚流光,其历史嬗变、演进之路漫长迂回且精彩纷呈,其思想、内容、涵育方式具有丰富的当代意蕴。新时代中国家庭德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社会意志“绑架”下的结构性“硬伤”,古今中外文化的杂糅与冲突,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的贫乏,家庭“自我”的疏离,德育的“过度”,等等。着眼未来,中国家庭德育需要宏观的制度治理,即创新与优化国家有关法律制度,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更需要微观的家校协同,如构建家校德育联动机制,凝聚家校共育强大合力。显然,这才是新时代中国家庭德育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解决现实困境到构建未来幸福的发展进路。

关键词:家庭德育;社会意志;德育制度;家校联动

中图分类号:G41;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4)04-0116-07

探赜中国家庭德育发展的进路,既要知其来路,亦要晓其去路。回望来路,是为溯源传统,探其内容,究其意蕴,得其价值;开拓进路,是为构建发展方略,开创发展新局面。将“今日现实”看作介于“来路”与“进路”之间的链节点,破解今日现实之困局,是为夯实发展基础,确立发展方向。因此,为了推动中国家庭德育高质量、优结构、内涵式发展,明晰新时代中国家庭德育的发展路向并构建推进方略,当成为家庭德育建设的振裘持领之举。

1 回望来路:中国传统家庭德育的继承与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积厚流光,中国家庭德育传统亦然。在论及教育的历史渊源时,一般认为:学校教育后发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以家庭德育为要、为先。上溯至数千年前,家庭德育随着家庭的出现而产生;紧接着,它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家庭形态内容的演进而不断嬗变。钩沉稽古,发微抉隐,本研究于史海中探微、溯源中国家

庭德育的“基因”“血统”和来路,以求矫治中国家庭德育的问题,为开拓新时代家庭德育发展之路寻找史实依据和理论突破口。

首先,回顾中国家庭德育思想内容之发轫与演进。在失于文字的年代,先民们以口耳相传之方式施行德育。质言之,在有可考文献记载之前,家庭德育已产生良久。然而,无文献可征的口头德育,我们无从研究。概览中国传统家庭德育之演变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先秦至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近代以降。从发轫、发展,到臻于成熟、定型,再到创新、转型,中国家庭德育在其内部矛盾的驱动下,在不断地变革、扬弃以及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前进中,在历经各阶段“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之后,蜕变为今日之态势与意涵。

纳入视域的相关研究内容浩如烟海,我们且就德育思想的演进略作管窥。第一阶段,如:周公告诫成王如何“戒逸”(见《尚书》);孔子通过“过庭之训”教导儿子“彬彬有礼”(见《论语》)。第二阶段,如:颜之推将“治人、勉学、修德”之家庭

收稿日期:2023-04-0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YBQ013)

作者简介:欧阳鹏(1991—),男,湖南湘潭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德育方略详实系统地溢于纸册,而赋《颜氏家训》。第三阶段,如:宋人袁采作《袁氏世范》,对如何“睦亲、处己、治家”等阐释深刻见解。第四阶段,如:曾国藩之以“修业、进德”(而非举业、谋利)为目的的劝学思想,以“敬恕、为善、戒骄”为核心的为人思想,以“勤勉、节俭、和气”为要旨的理家思想。第五阶段,近代以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沧桑巨变,这在家庭德育中也有所体现,如:以“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理念昭著的《傅雷家书》,堪为近代家庭德育思想转型的代表之作。

其次,体察中国传统家庭涵育方法之道。涵育方法,是德育影响能否被受教育者充分吸收且有效内化到其“知、情、意、行”结构中去的关键因素。敏而好古于中国传统家庭德育方法之深邃义理,我们系统扼要地将其归纳为以下方面:环境熏陶与道德自觉并济;亲情感化与规则约束兼具;典范引领与言传身教相融;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同行;知识传授与历练践履贯通……言之以详,即:重视环境濡染默化之作用,敦促儿童自主、自觉、自律地修身立德;采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亲情“化人”方略;依托家规家法等实施惩戒、体罚性德育;发挥榜样人物助人见贤思齐的教化功能;关注德育者自身德性修养提升及其言行举止的示范功能;尊重孩子的习性、禀赋、兴趣等个性特征及其发展需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客观规律以及知行合一的德育原则;等等。

再次,关注中国传统家庭德育思想之当代借鉴。中国传统家庭“以德为本、厚德载物”“志存高远、心系天下”“穷且益坚、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砥砺情操”^[1]的德育思想,对现代家庭德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譬如,在传统家庭中,德育与教育的内容几无二致,德育不仅是全部教育的基础,还是其主要构成部分。换言之,发生在家庭中的几乎一切教育活动,都是用来锤炼人品性的途径,或至少蕴含了这种功能。究其实质,这与杜威“教育上满足需要的一切目的和价值,它们自身应是合乎道德的”^[2]教育理念相契合。然而,在现代社会,家庭德育被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或观念干扰、裹挟,舍本逐末、利益至上、罔顾规律的家风正大行其道。这就亟需从传统文化中取经,从来路中汲取当代家

庭德育发展所需的营养。除内容、思想外,上文所提及的传统家庭德育的方法原则,也皆是值得当代家庭去反思、承续和倡导的。

2 检视现实:中国家庭德育发展的困境

新的时代,有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新的裂痕需要弥合,新的问题需要检视。显然,新时代的家庭德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很多,且错综复杂,牵连的因素非常广泛。本文主要从一些较为常见或严重的困境中,择其重点而述之。

其一,社会意志“绑架”下的结构性“硬伤”,让家庭德育被动且尽显无奈。家庭由个人所组成,但它又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就家庭与个体、与社会系统的交互关系以及家庭本身的属性与功能而论,家庭、家庭德育被社会意志所“绑架”的状况,在短期内是难以治愈的结构性“硬伤”。实际上,家庭德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在家庭“场域”中的反映和呈现。而父母诸多大谬不然的德育逻辑观念、德育行为方式,其实是在社会的风尚、制度及形势下“倒逼”而生。如:并非广大父母执拗于或钟爱“重智轻德”“重分轻能”的教育方式,也并非他们“沉溺”于为孩子报送补习班“不可自拔”——这在很多时候于父母们而言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被动与无奈。然而,家庭问题牵扯的社会层面的整体和系统改变,并非一蹴而就的。因此,当下我国家庭德育的结构性困境具有必然性,且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3]。

其二,古今中外文化杂糅与冲突背景下,家庭德育发展面临文化选择与坚守的困局。生产力发展,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加之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使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一日千里。全球化,蕴含着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的输出。新时代,是文化交融的时代,是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时代。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与调适问题,如何有效继承、活化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去粗取精、批判吸收“舶来”文化,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项复杂的“技术活”。文化,有的作为家庭德育的内容,有的则影响家庭德育的价值导向、思想理念、方法目的等。相较于学校德育统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础和导引,家庭德育在面临多元文化的选择时,具有更多个性、

自主性与自由度。如何破解家庭德育过程中的文化坚守与取舍困局,使文化之于家庭德育的功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尚存疑难。

其三,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贫乏,经验式、随意性家庭德育缺少理论与方法自觉。相较于学校德育过程所具有的系统性、计划性和统筹性,家庭德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流的、无意识的、生活性的以及实践性的,它缺失基于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的指导思想、教学方略、知识载体、组织形式、评估范式等。这使得其在目的、内容、方法之科学性、适切性、全面性方面,存在巨大隐患与不确定性。“经验式”传统家庭德育的存续,让人们对家庭德育的认知滞留于对现象的描述和总结之维,而疏于对家庭德育规律和原理的深刻体悟。零散的、片面的既有理论研究成果,无法为家庭德育实践提供科学导引,更不能实现对未来的科学预测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完善而健全的“理论与方法引领”的缺失,外加上文提及的“新时代文化内容、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日益多元化”及其选择的日趋多样性,使得家长每每被席卷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所感”的社会“潮流或浪涌”中,或是无所适从,或是亦步亦趋,或是“左右逢源”,或是“颠三倒四”。因而,家庭德育呈现出随意性、错乱性和迷失性的现象司空见惯,自觉性、自主性和科学理性却从来贫乏或缺位。

其四,家庭“自我”的疏离,引致“唯学校论”或“学校从属论”的迷思。家庭与学校,是个体身心发展的两个重要场域。这两个场域,在内容与功能上,有诸多的交互性、关联性和一致性,且在很多时候需要相互补充、融合及贯通。然而,家庭德育与学校德育是“分门别类”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两者有着十分清晰的边界和大相径庭的运行机理,其内容、职能和功能不可相互僭越、替代。就家庭德育而言,它本就有其独一无二的能证成其本质属性、确立其内容结构、展现其品相特征、标识其存在方式的“自我灵魂”,也即专属的“姓与名”。但现在这个“自我”发生了疏离(抑或剥离),这个“灵魂”正在迷失。家庭“自我”出现疏离,主要与以下几个误区相关:家长认为德育纯粹是学校职责,家庭与此无甚瓜葛——这就导致家庭德育影响几近缺失;一切以学校为中心,家庭德育沦为学校教育的从属和附庸,失掉了其本真的“主心骨”;学校为响应上级部门的有关决策部

署而给学生大幅减负释压,结果却事与愿违——学校的本职事宜不得不由家庭完成,教师的本职工作转交由父母承担,家校职能明显脱节、易位。

其五,德育“过度”成为悖谬于德育规律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家庭德育常态。本研究所探讨的德育“过度”,主要指两方面:一是无视影响德育的适龄性、阶段性和连续性规律的“超前德育”,也即“过度的德育”;二是将同一德育内容进行反复、冗长和“无休无止”灌输的“重复德育”。究其根由,“揠苗助长”的因素不胜枚举,如:国家相关制度引致,社会风气“倒逼”,父母观念使然,等等。其危害主要包括掣肘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剥夺儿童的快乐天性,阻碍儿童积极品质的养成。“过犹不及、矫枉过正”之哲学义理,亦适用于家庭德育。“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或适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念,是中国人素来的为人之本、处世之道。理想的家庭德育,要让个体生命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根据自身的内在基础与发展特点来充分彰显自身,使得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都能达到自身功能的最大化——个体生命在此过程中逐步趋于完整而健全^[4]。

3 展望未来:新时代中国家庭德育的发展方略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创新与优化国家制度,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家庭德育制度治理的必然要求;构建家校德育联动机制,凝聚家校共育强大合力,是家庭德育家校协同的现实需要。

3.1 在国家及社会宏观层面,创新与优化相关制度,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度是导向,是规范,是保障,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掣肘、阻碍乃至桎梏。“恶法非法”,当制度的积弊、缺陷过多,或制度已为“隔年皇历”,不再适切于现实需求时,就当及时涤瑕荡秽、杼井易水,以推动制度变革。因此,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价值、内容、功能等方面着力,处理好扩大有效供给与提高供给品质,清理无效供给与激发合理需求,理顺结构调整的目的与供给侧改革的手段,拓宽供给渠道与优化多元治理四对基本关系^[5],是制度创新与优化的良方。

第一,确立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从规范向引

导、工具化向人本化、“刚性普适性”向“柔性个适性”转型。与家庭德育相关的制度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除家庭德育制度本身外,与家庭、教育、伦理等相关的制度,以及其他制度中与家庭德育相关的因素、内容和功能,都应纳入本研究所论及制度的范畴。制度的作用和功能本是多元的,但就中国而言,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章程、准则等)主要发挥着规范人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确立主体权责、保障机构运转的功效。换言之,制度在更大程度上是规范和约束性质的,它像“冷漠的工具”一样,告诫人们“孰可为,孰不可为”“违反的后果如何”等,它适用于所有人且几乎没有弹性。然而,各家各户之德育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儿童个性发展与创造力培养的具体德育需求,更是迥然相异。用同一个模子去铸就、同一把尺子去衡量的制度方式,往往会造成德育缺失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家庭德育相关制度的出台或创新,应更多地彰显人性关怀,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发挥制度的引导作用、教育作用、评价作用和预防作用,实现柔性个适性与公平公正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刊谬补缺,创新制度内容,推动各领域、各阶位家庭德育相关制度“合纵连横”。当前,我国家庭德育存在功能弱化、家长不作为、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各方重视程度和践行力不足等问题,这无疑与家庭德育制度资源匮乏密切相关。现存的大部分德育制度,都是立足于学校场域的。尽管“相关”,但由于并非为家庭德育“量身定制”,其内涵、功能以及价值对于家庭德育,更多的是侧面的、间接的和辅助性的。在分析、明确家庭德育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文明建设进程的重要影响后,国家有关机构和部门需要加强、加大、加快家庭德育相关制度资源的供给,改善供给方式和措施^[6]。可喜的是,国家正日趋关注、重视家庭德育相关制度结构内容的设计和创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于2021年出台。就立法来说,家庭教育类立法“应当秉持人权保护、伦理道德、终身奠基与和谐共促的精神,从宏观的纲领性意义、中观的立法要素和微观的语言表述三个方面把握家庭教育法的立法技术”^[7]。总之,我们应当看到,家庭德育相关制度的设计或嬗变,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关部门应致力于科学构建能统筹各领域、各

阶位家庭德育需求的制度内容体系,并切实推动各项制度“合纵连横”“共同育德”,为家庭德育提供坚实保障,创造发展契机。

第三,推动法制、法治、德治的体认与共生,夯实家庭德育质量提升的伦理和制度基础。法制侧重法律体系的建构及施行;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权责明确”的法理要求;德治重视以德化人,旨在通过道德内化、良心内控,来改造人的心理结构,使人心地善良、知羞识廉,而不为非作歹。究其三者的关系:德育(尤其家庭德育)是德治的主要途径;完善的制度架构是弘扬“法律至上”理念、彰显法治精神、实现法治目标的基础;德治与法治不仅在抽象意义上具有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也在历史经验语境下具有理论上的相容关系^[8],德治是法治的引领、支撑与评价尺度。从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论,法制、法治、德治的体认与共生,是家庭德育质量提升的伦理和制度基础。这是因为唯有以上三者相得益彰、相与为一,家庭德育方能在尊重个体身心(包括道德品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与外部制度环境的“无缝连接”。这有利于家庭德育的质量提升,也对其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和功能大有裨益,进而创造、推动“人越有德、人越守法、法越健全”的社会良性循环。

第四,强化制度家庭德育与家庭德育制度的互洽,确立制度的德育向度与德育的制度凭依。制度家庭德育,即创生、发觉、发挥制度的家庭德育功能。制度作为“要求人们共同遵循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构建的、反映了一定社会建设需要与时代发展需求的、高度凝练的“条条框框”。尽管它的“分娩”在“须臾”完成,但其“备孕”“怀孕”却是经年累月的时间洗礼、历史浪淘过程。因此,制度的存续既是“机缘巧合”,又是“时势必然”,制度的“基因”中必定“镌刻”着其意涵之证成与“缘起”、价值之导向与“进路”、方法之选择与运用等内容。因此,它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个“意味深长”中,拓展制度的“德育韵味”、丰富制度的“道德话语”,就成为“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进而言之,推动“普通制度的家庭德育价值实现”与“家庭德育制度的科学构建”的有效互洽、融通,是确立制度的德育向度与德育的制度凭依的必要条件,也是纾解“制度

与家庭德育难以良性接轨、互通”困局的可行方略。

3.2 在家校及个体层面,洞悉家校德育分野与共生之道,科学把握个体道德发展与培育机理的“一体两面”

家庭德育并非由家庭在闭关自守中完成,它需要与学校德育携手同行,共谋发展。家庭德育与学校德育是儿童思想品德发展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共育的强大合力,是新时代个体道德培育的现实需要。

其一,明晰家校德育联动、分工的关系及边界,打造协作相通且互不从属的共育格局。构建家校联动机制,先当确立家庭德育与学校德育各自的内容、功能与职能。家庭德育与学校德育有着各自独立的目的、内容、方法、评价范式,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助力个体道德发展的“场域”,也侧重于不同的道德发展内容。例如:学校可以充分利用德育师资“专门化”、组织形式“集体化”、教育影响“系统化”等有利条件;家庭则应当恰当运用亲子关系的“易感性”与“针对性”、德育过程的“持续性”与“潜隐性”等特殊优势。再如,学校德育的主要任务是狠抓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侧重于“道德、思想、政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主理念、法治思想”的内容,家庭德育则偏向于“理想、三观、意志、情操、性格、劳动、心理健康、待人接物、齐家睦亲、立身处世”之道。明晰、厘清家校德育联动、分工的关系及边界,就是要杜绝、规避家与校之间的德育功能僭越(如家庭德育成为学校德育之附庸)、德育职能替换(如家长辅导功课、陪伴学习、批改作业)和德育归因错位(如家长会成为对家长的通报批评会^[9])等乱象,就是要敦促彼此充分让渡原本属于对方的时间与空间。

其二,增进家长(亲职)教育供给,重视家庭德育理论研究,强化学校对家庭德育的理论支撑。家庭德育不具备学校德育(如职能的专门性、组织的严密性、作用的全面性、内容的系统性、手段的有效性、形式的稳定性)的诸多条件与特征,其德育影响也不曾经过“高度凝练、提纲挈领”,从而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目的性、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同时,通常情况下,家长的“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远不及经过专业培训且取得教师资格的学校教师。因此,秉着“以生为本”的理念,基

于“联手共育”的目的,学校有必要、有义务为家庭德育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此处“学校”包括“高等学校”与“基础教育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就基础教育学校而言,它应致力于及时关注、了解在校学生的家庭德育动向,为其家庭德育的实施提供适切性帮助。如:为家庭德育提供内容资源或教学建议;针对家庭德育实施方法提供指导性意见;采取积极措施取得家长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敦促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联手共育过程中来;构建具体可行的协作途径和制度(如家长委员会、学校开放日、家长座谈会、教师家访等);及时共享信息,充分保障德育影响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就高等学校而言,应多措并举强化家庭德育研究(以“提高研究水平、争创优质成果”为目的,拓展研究领域,壮大研究队伍,丰富研究方法,增强研究内容的时代性,注重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开设家庭德育学科专业,完善家庭德育课程体系。

其三,提升学校对家庭德育实践的驱动作用,规避校园欺凌、校园虚荣现象,及时反馈学生道德发展状况。驱散校园欺凌,呵护校园“弱者”,已日趋为社会所重视。然校园欺凌的危害,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严重。校园欺凌是指一名学生或一群学生对另一名无力反抗的学生发起的具有明确伤害意图的攻击性行为。该行为呈反复性或持续性,且形式不一,从直接的身体和言语攻击到间接的孤立和排斥,以及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而流行的网络欺凌^[10]。这是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奥维斯(O. Dan.)对校园欺凌的定义,也是唯一得到 OECD、UNESCO、WHO 和 UNICEF 等国际组织认可的定义。校园欺凌者大多心理扭曲,手段残忍,可致被欺凌者伤残或死亡(或因暴力致死,或因不堪欺凌自杀)。欺凌行为亦对旁观者的身心造成损害。校园虚荣同样危害甚笃。虚荣是自尊心发生扭曲的结果,是一种追求“虚表”的性格缺陷。校园虚荣使学生或通过虚伪言行去猎取名誉,或借以怪诞穿着、举动来吸引同伴注意。盲目攀比、好大喜功、强烈的嫉妒心、过强的表现欲、过分在意他人评价等,是校园虚荣常见的心理或行为特征。在校学生通过“校园贷”满足虚荣心,以致最终因“无力偿贷”而走向绝路的惨剧,是校园虚荣危害的极端案例。校园欺凌与校园虚荣看似是学校德育的“分内之事”(主体关系介于在校学

生之间,行为对象是同学或同学的评价,发生地点多为校园),但欺凌者、虚荣者的心理“扭曲”之源通常与家庭、家庭德育脱不开干系,其行为后果亦反作用于家庭。学校要做的,不仅是从学校本位出发,行教育、矫治、法办之责,还应实时“跟踪”学生的行为表现、道德状况,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家庭。学校当配合家庭,共寻道德“恶行”之源,共开道德“恶行”之方,共治道德“恶行”之症。

其四,发展学校德育的“个适性”,在考量具体家庭德育现实的基础上设计德育内容及方式。在学校德育中,人们多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自身素质、性格志趣、学习能力、认知水平”等因素来采用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进而发扬长处,弥补不足,培养兴趣,增强自信。这也即“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备受推崇的原因。因材施教从“学生个体”的发展“表征”出发,“量身定制”教育行为。它看似科学,毕竟它紧贴“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因材施教”在很大程度上只着眼、立足于事实与表面,并将其作为行为依据。这个“事实与表面”在很多时候仅是“冰山一角”,而非“事实本体”“事实真相”,它甚至悖谬于客观本位,展现出截然相反的虚诞假象。这即“因材施教”的不足。对于“材”之本真的“误解”,使得教育行为发生偏离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因材施教”在某种意义上有治标不治本之嫌:它仅对病状、病灶、病象开方,却不对病原、病因、病理下药。换言之,它在很多时候不能“鞭辟入里”,不能“对症下药”且“药到病除”。就德育而言,所谓因材施教,在很多时候并未适切于学生道德发展的真实状况,更遑论深入“片面表象”之下、之内的“真切本质”。发展学校德育的“个适性”,在考量具体家庭德育现实的基础上设计德育内容及方式,并非是学校德育成为家庭德育的附庸,而是要强化学校德育对于家庭德育(以及家庭德育下的儿童道德发展现状)的“个适”与匹配。这是因为就同一所学校来说,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影响相差无几,但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生态却千差万别。况且,家庭德育对于孩子道德发展具有无出其右的深刻影响。因此,在考量具体家庭德育现实的基础上设计德育内容及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必要。学校对家庭的“个适”,才是深入“致病机理”的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

其五,家校联合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提升学生对家庭德育影响的检视、选择与接受能力。叶圣陶提出“教是为了不教”。这种“不教”之“教”不仅是“教”的结果,而且是内含在当下教的实践之中,辩证地统一在当下之教的过程本身^[11]。换言之,堪称优秀的教育者,在将自己的影响施加于学生身心的同时,又显现出另一种倾向,即:将自己的影响从学生生命世界抽离,以此来保持学生个体精神发展真正的独立性,让学生成为其自我,让学生自主、自立,而非作为教师影响的延伸。由此推及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就家庭而言。家庭要想设法规避“控制”因素,即父母在德育过程中,千万不能随心所欲地将自身思想、喜好强加于孩子身心。“控制”,会让孩子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创新之品性、果敢之精神逐渐泯灭,进而成为父母或祖辈的复制品,而非他自己。另外,“控制”对社会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研究表明,在控制型(专制型)家庭德育环境中,青少年有着较高的道德推脱水平^[12]。当然,仅做到“不控制”还远远不够。家庭作为一个应然的“温暖港湾”,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提升孩子的创造力、让孩子成为“具备完满人性”的人等方面,拥有更多(有些是独一无二)的条件、机会和可能。二是就学校而论。现阶段,由于不少家长的“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有待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知识结构”不尽完善,父母素养提升应成为新时代家齐国治的必修工程^[13]。在家校联动、共育过程中,学校有责任致力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发展”——提升学生家庭德育影响的检视、选择与接受能力,才不至于让有些学生在恶劣的家庭环境“浊浪”中“依水如浮萍”。

参考文献:

- [1] 戴素芳.传统家训的伦理之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64.
- [2]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74.
- [3] 丛晓波,刘鑫文.转型期我国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39-144.
- [4] 刘铁芳.走向整全的人:个体成长与教育的内在秩序[J].教育研究,2017(5):33-42.
- [5] 周海涛,朱玉成.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几个关系[J].教育研究,2016(12):30-34.

- [6] 欧阳鹏,胡弼成.家庭德育:为人一生的发展奠基[J].大学教育科学,2018(4):10-17.
- [7] 祁占勇,杜越.家庭教育立法的现实诉求及其立法精神与技术[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24-31.
- [8] 舒国滢,王重尧.德治与法治相容关系的理论证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43-49.
- [9] 刘利民.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边界[J].中国教育学刊,2017(7):43-47.
- [10] Dan O. School Bullying: Development and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 [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9):751-780.
- [11] 刘铁芳,颜桂花.教师:活在师生关系之中[J].大学教育科学,2015(3):76-81.
- [12] 刘国雄,陆婷.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及其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2013(4):78-84.
- [13] 胡弼成,姚云龙.父母素养提升:新时代家齐国治的必修工程[J].当代教育论坛,2019(2):1-14.

A 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OUYANG Peng¹, HU Jie²

(1.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Industrial Design and Art College, 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live and grow, and mor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moral edu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s thoughts, contents,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have rich contemporary meaning. The re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structural problems under the “abduction” of social will, the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e lack of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and rational thinking, the alienation of the family “self”, and the excessive moral education. So innov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related national legal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of system resources are necessary ways to externally promoting family moral education quality. Meanwhile, building a family-school moral education linkage mechanism and consolidating the strong synergy of family-school co-education are inevitable conditions for internal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mily moral education. Obviously, they are the development path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amily moral education; social will;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amily-school linkage

(责任校对 唐尧)